

司農往事話桑麻

成都脫險飛往香港

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重慶撤退，成都各街道都已修建了木柵，秩序大亂，行政工作極感困難。我先將農地減租工作結束，次將四川省合作事業管理處處長職務交卸報告省政府最高負責人後，經多方奔走欲得一飛機票飛來臺灣，已臨絕望之際，承友人之助，派任經濟部職務，於十二月八日晚到成都鳳凰山機場停留兩晚，行政院各部會首長陸續到達機場。謠傳我等搭機之機會已失，亦只能陸續飛到昆明。正在萬分危急驚險之時，幸能鎮定忍耐等候，於十二月十日上午突獲上機通知，在敵人包圍圈中，脫險飛離成都，直飛香港。到了香港，爲了搶救淪陷在大陸鄉間的家人，特地在香港停留了一些時間。

舊地重遊心情兩樣

早在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爆發時，我決心前往南京奔赴國難，因海口漸阻，恐滯留福建，乃攜眷離漳州，循海道，經香港，曾在香港漫遊三日，一切猶在記憶之中。不意相隔十二年，竟拋離家人，再來香港

，雖然「舊地重遊」，實則亡命他鄉，前後心情各異。飛機到達九龍機場，下機後即與郭士沅等合租壹車過海到香港，找尋旅館，那時的香港四處均告客滿，我在干諾道中遇彭勳武，因已超過廿四小時未進飲食，不得已，在路旁一餐館中叫一客便餐，剛吃下一口菜湯，竟然大吐；因爲在鳳凰山機場狂風中露宿兩夜，我在一大卡車中和人共一棉被僅能蓋腳部，受了風寒。回憶盧作孚在八年前託我加緊催糧，當時他說：「請兄幫忙，我們交一朋友，好嗎？」這個「交一朋友」之戲言，這時得到招待暫住三角碼頭的生公司那門輪上，伙食自理。輪懸青天白日旗，員工多四川人，言談均尊崇中央政府。我上船疲倦已極，蒙頭大睡，放棄午晚餐，半夜醒來，全身大汗，衣被均濕，次晨起身，病況減輕不少，想到出走時之艱險困難，脫離危城，真有「得慶更生」的欣幸之感。在四川成都爲辦理土地改革而忙亂數月，爲計畫出走而心裏沈重多天，到達「東方之珠」的香港，偷生苟安，難計其他。民生公司之門字號輪船，係新從加拿大運回，設備新穎，華貴美觀，中西餐俱備。香港洋貨充斥，應有盡有，物美價廉，電影、平劇、跑馬、賽球，各投所好。當時徐堪（可亭）、盧作孚、何北衡、劉航琛、楊俊清、吳邦護諸兄等均有家在港，我不時和他們往來，危難中相聚，倍感親切，所幸的，我們對一般的邪遊、賭博、投機，一概未予參加。但香港這一殖民地地方賭博、投機，無所不有，是有錢人的天堂，冒險家的樂園，也是窮人的人間地獄。

澳門地方罪惡淵藪

初到港，某日盧作孚約謝明霄、彭勳武與我乘虎門輪遊澳門，沿途風景優美，抵澳門時沈宗瀚來迎，並接盧作孚的子媳一同到他家，可見盧、沈之間的深厚關係，我等由嚮導帶領遊覽澳門市區與郊外，海濱山水如畫，豪紳巨賈的別墅點綴其間，如瓊樓玉宇，與中山縣界僅隔一城門，黑人守衛，膚色如黑漆，與常見之淺色黑人不同。市面極繁榮，嫖賭鴉片，一律公開，走私販毒，隨處可聞，殖民地政府以收稅爲目的，收稅以地方繁榮爲先務，一切放縱，又爲促成繁榮之條件，故對作奸犯科，似理不理。中央商場，樓高數層，各式各樣的賭博，花樣翻新，住在茶肆酒樓，亦可在電視牌上觀察賭局而投注，日夜沈迷於此的很多，傾家蕩產於此的更難以數計，稱澳門爲「罪惡淵藪」實不爲過。在澳門曾承包華國、梁穎文兩同鄉招待，患難中得到朋友同鄉的接待同情，迄今猶感念難忘。

盧作孚何北衡被騙

在香港停留時間一久，不能不想到以後如何生活？民生公司經濟情形很壞，常見盧作孚抄手立公司窗前，遠望愁思。後與何北衡等商量結果，民生公司有船約二十餘隻，多係平底船，原預備航行長江，不能航行遠洋，但可在東南亞國家傍岸開行，辦理航運，先須在東南亞找一據點，於是有在山打根經營農場種植橡膠的打算，他們商量好，要我以勞資合作方式主辦，民生公司可設法接我家眷出來，我答應了。何北衡準備經馬尼拉飛山打根先行接洽，在要走的前晚，何迺仁奉民盟投共的張瀾之命來港，盧作孚、何北衡

、謝明霄、彭勳武等人受共偽的欺騙愚弄，一個急轉彎，改變主意，要回大陸，因為他們相信他們困難的事業，都可得到共偽貸款的誑言。我用盡方法，都不能勸阻。數次與彭勳武語言對抗，何北衡的太太，似覺得回大陸可怕，曾向何廻仁說：「何二哥！你能保得將軍去，保得將軍回嗎？」我說：「自身難保，還保得了誰！」謝明霄也說：「袁哥子（他們都戲稱我袁哥子）將來勝利飛回重慶珊瑚壩，我們會來歡迎你。」我說：「你回去還能活多久啊？」彭勳武大說粗話：「你說過球！」後來彭私自會坦白的說：「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我也說：「既知不是伴，何必苦相隨！」分手最後的一些時間，出街他們不同我走在一道，連話也不講！何、彭先走，盧、謝走的時候，我已經不知道了。就剩下我在香港，不回去就是不去，時時還想法接家眷出來。後來何北衡回香港接家眷，在報上看見韓戰爆發，有失悔的意思，並曾自言自語的說：「美國這個國家很怪，說不定會幫助國民政府打回大陸。」他心裏雖動搖，但不能不回大陸，這時何北衡已被共偽套牢，不回去也不行了。

回到復興基地台灣

我離開民生公司的船，吳先培、劉曼梅兄嫂請我到他們家居住，款待如賓客，不時安慰，幸得苟活，但曠日持久，接家眷的籌畫，漸感無望，中年棄家，其苦可知！每天不是到太平山頂去散步，就是到海邊枯坐，神魂顛倒，如痴如醉，任性的抽煙喝酒，等於慢性自殺。每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常悶坐港九渡輪隨其

往來，幾次都想跳海，以求解脫。有一天站在渡輪上所掛的鏡前一看，形容枯瘦，黯淡的神態，幾乎認不出自己來。仔細思量，父母生我，國家培植我，爲的是什麼？如輕生自殺，對社會何益？對家庭何補？一轉念間，我還應該替社會作些事才是！要活下去！應該活下去！協助我接家眷的親戚，自大陸來信語氣突變，惡毒的謾罵，家眷離開大陸來香港的希望已絕，爲挽救頹敗的身體，祇好毅然暫時拋開無法救出的家人，隻身來臺。於民國四十年三月廿一日搭四川輪離香港，當夜風浪大作，輪船上下迴旋，聲如迅雷，我本來不暈船，因體虛不能不靜臥，次晨天還未亮，我起身入廁，望遠處如水晶宮殿，間茶房近處無陸地，這不是「海市蜃樓」嗎？其實佛家早說過：「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不過人有時未了悟罷了！

回到了久已嚮往的復興基地臺灣，船抵基隆，欣喜欲狂，老友彭汝爲兄等在碼頭迎接。臺灣稱寶島，名不虛傳；雄奇的山，秀麗的水，翠綠的樹木，鮮艷的花草，處處使人心曠神怡，加以政治革新，農作增產，工商發達，國民所得增加，生活亦隨着改善。願此蓬蓬勃勃的朝氣日有所增，國家的壯大，可計日而待。我隻身來到臺北，感喟萬千，繫念眷屬的心情，無法排解。因此任何事都打不起精神來，事業、娛樂毫無興趣，惆悵愁煩，若有所失。民國四十年農曆六月初六日，爲侯警齋生日，在客室逗他小孩嬉戲，他小孩的年齡與我的兒女相差不多，觸景生情，心事重重，入席飲酒，毫不推杯。散後由臺北市警察局長李德洋駕車送袁永馥與我返和平西路二段卅二巷六號寓，袁永馥引我由後門進，無燈，庭中水泥地上有洗衣潑傾之肥皂水，一不小心，滑倒在地，強起入室，臥榻榻米上，汗流浹背，衆方發笑，我已覺察右肩骨已

斷，衆人不信，我請查報上于善堂接骨中醫師診療處所往診，果判爲骨折，遭此不幸，反集中精力在如何救治。當夜已晚，次日往照X光後，轉往中心診所，由骨科名家俞大夫治療，反紮兩臂，滿上石膏，起居睡眠，痛苦萬狀，兩日後俞大夫說：「能忍受否？」我咬緊牙關答說：「能。」又一日，俞說：「那能受得了！不如開刀。」乃住院動手術，鎖骨小，既不能用螺絲釘，又不能用銅絲繞，乃於右肩開一洞，以不銹鋼一條穿入，貫於鎖骨上，養息月餘，始將鋼條抽出，癒後與未折前同，於今相隔多年無異狀。惟手術前上麻藥關係，毛翎後仍嘔吐，神志昏昏，講話一片天真，毫不受理智支配，爲生平首次天真幼稚的表演。在香港不死，大難已免，小災難逃，逆來順受，心情更趨平淡。

陳果夫師遽歸道山

到臺北經若干時日的休養，方去前往晉見我的老師前中央政校教育長陳果夫先生，先生臥病在床，一見面即強起說：「知你來已多天。」隨即詢問四川撤退時之黨政情形，又問政大同學在大邑一帶參戰情形。更談到主辦的合作事業，先生興趣甚濃，我恐怕他老人家過於疲勞，數次起身告辭，先生說：「不要緊，稍談無妨。」最後辭去的時候，先生說：「你身體既已養息好了，當從事工作。」不久果夫先生即商蔣夢麟先生要湯惠蓀先生邀我擔任農復會有關的工作。四十年六月廿七日果夫先生派專人送來一函，約翌日往見，先生立於床畔，喜形於色說：「我見農復會第一輯報告，盛讚你主持四川農地減租之成就，我因此報告

老校長總裁蔣公，曾說：『有此成就而不自矜伐的篤實學生，應該注意。』老校長蔣公必將召見你，你應有所準備，答辭宜謙遜，並勿偏重個人希望和請求。」果夫先生留我談話甚久，我說出以農村經濟建設組訓農民之意見，即在增加生產改善農民生活的過程中，建立農村中民主政治的深厚基礎，果夫先生頻頻點頭稱是，並說：「可將此意見速向谷正綱先生詳陳。」其時谷先生尚在執政黨中央黨部負民衆組訓責任，臨行果夫先生再三說：「見過校長後，速將結果報告。」我辭別果夫先生返家休養，不久接奉總統府通知蔣公定期召見，這時我正傷臂，求緩見，八月廿五日晚與汪沛然在吳先培家吃麵，余建寅同學匆匆來告：「果夫先生已歸道山！」我立即扶傷往弔，程世傑兄說：「先生在病中曾問到你見老校長後的結果！」我聽後更覺神傷。果夫先生對新舊知識均悉心研究，故能明人之所不能明，言人之所不能言，公忠體國，無私無我，凡足以福國利民的，莫不虛心以求。輔佐先總統蔣公，事無巨細，並顧兼籌，任勞而且任怨，苦心孤詣，培育人才，提攜後進，以爲國用，凡有一技之長的都登錄卡片，量才薦使。我承教誨廿餘年，從未聞其有排除異己之言，諄諄告誡要真誠與人合作。

公地放領計畫督導

後農復會土地組長湯惠蓀先生來到我寓所說：「果夫先生曾請蔣夢麟先生和我爲老兄安排工作，現農復會有一補助公地放領計畫，由省政府執行分四區聘設督導，請老兄擔任北區督導。」我當即面向湯惠蓀

先生懇辭，並請代向蔣夢麟先生辭謝。不久以後湯先生又來，我仍懇辭，並說：「我手跌傷，何能工作？」第三次湯先生又再來說：「你不擔任農村復興有關的工作，夢麟先生和我都無法交代。」我在心情沉重下答應了，因為這時果夫先生已歸道山。我既然答應，參加工作就應認真執行職務，每次公出，均由臺灣省地政局第三科科长，後任地政局長的簡清榆兄陪同。地區包括苗栗、新竹、桃園、臺北縣、臺北市、陽明山管理局、基隆、宜蘭八縣市局。有一次預定要從桃園到中壢以南一個鄉村去，無交通工具，又值颶風驟雨，有些地政人員都勸我不要去，我認爲既已約定，絕無不去之理。風大雨大，傘都壞了，仍然冒著大風雨，全身濕透去辦完工作，傳遍地政人員，稱許我「敬業樂羣」。簡清榆兄的工作很忙，我告訴他說：「什麼地方應該去，我自己去，不要再勞煩你陪去，你可作其他的事，如何督導？依照預定計畫進行，發生疑難問題，我自會依照法與理去解決。」過了不久奉到先總統蔣公召見的通知，我管見蔣公後，蔣公指定要我入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受訓過後，又奉指定留院作輔導委員，編訂「黨政演習要領」、「黨政演習實施綱要」、「黨政演習業務書」等，雖然很忙，到各縣市去督導的工作仍未中輟。

放領公地嘉惠農民

公有耕地分國有、縣市有、鄉鎮有及公營事業有等，我參加之公地放領，係放領縣市有及公營事業有一段時期。放領公地係實施三七五減租後，將公有耕地放領與需要的農民，農民取得土地後，樂於投資土

地改良，努力增加生產，收益增加，生活水準亦隨之提高。這與我增加生產，改善人民生活之志願相符。承受公地放領人之次序爲：

(一)、承租公地之現耕農；(二)、雇農；(三)、承租公地不足之佃農；(四)、耕地不足之半自耕農；(五)、無土地耕作之原土地關係人；(六)、轉業爲農者。每戶承領公地：田五分至二甲，畑一甲至四甲，但田畑分上中下三等：一則至八則爲上等，九則至十八則爲中等，十九則以下爲下等，授權各縣市政府分別擬定，承領人如爲依法承租之農戶，其承租面積，既經配租，故規定依原租面積放領。

放領地價照土地等則全年正產物收穫量兩倍半折成實物計算，地價分十年攤還，每年攤還數額，包括田賦或土地稅以不超過土地全年正產物收穫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爲準，這對農民不可謂不優。如願提前繳清地價，在不影響其生活及生產經營情形，政府亦予同意。地價分上下兩期繳納，以適應農戶負擔能力，繳納地價以繳納實物爲原則，亦可按照實物繳納數量，依當地縣市政府公佈之市價折繳代金，田以稻穀，畑以甘藷計算。公地承領人繳清地價後即取得所有權，依手續承領土地所有權狀。放領之國有土地，每年地價收入，悉數繳入國庫，撥作扶植自耕農基金；放領之省有土地，每年地價收入，超過原來租金收入部份，完全撥充扶植自耕農基金。

五萬農戶領耕公地

辦理公地放領的程序是：(一)查定放領公地：實施放領前，必須督促攜帶圖冊，實施逐筆調查其地目、等則、面積，地形變更情形以及合併或分割者，立予調整及測量。(二)公告申請放領：將放領之公地在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揭示公告，是時將放領公地清冊存置於鄉鎮市(區)公所，俾便申請人查閱，並以書面通知農戶，限期申請承領。(三)審核申請人：承辦機關接受農戶申請事件核對無誤後，彙送縣市(局)政府提交扶植自耕農促進委員會審查。該會係由地方公正人士、民意機關代表、承租農戶代表，以及有關人民團體等所組成。

全省公地因原有管理機關不同，故放領須分期辦理，民國四十年至四十二年分三期辦理。四十年辦理各縣市政府直接放租之公地共放領二九、三六九甲，承領農戶六一、七八二戶。

民國四十一年放領公地係各公營事業機構劃出，其中大部份係由臺糖公司管理的，共放出一七、八六八甲，承領農戶二九、八一四戶。四十二年放領之公地，大部份約百分之七十為臺糖公司繼續劃出之公地，少數約百分之三十為合作農場之公地，放領面積一二、四〇〇甲，承領農戶二二、七八五戶，兩者合計放領農戶五萬餘戶。

臺灣農村復興之路

因常在鄉間參加此項工作，我所得印象是：

(一)此項公地放領德政，農民身受其惠，如有邪說煽惑，不易介入。共產黨沒收私地歸公，國民黨以公地放領私有，其利害明顯而易見。

(二)土地由承租變爲自有，不但房屋修潔，樹木茂盛，道路平坦，而田地大加整理，耕作認真，於是普遍增產。

(三)無論老壯婦女，對有關切身利益之法令，非常熟悉，執行政令的，應嚴格守法，民亦守法，如對任何人稍有通融，則羣起效尤，不達目的，怨恨立起，所以施行法令，不能忽視「公平」原則。

(四)農民之能力不能以學歷衡量，本省人民的先世幾乎全都是大陸移民，其創造與努力精神，代代相傳，年高德劭的，「望重一方，一言九鼎」此等地方之自然領袖，不能輕視。

(五)生產增加，自然生活也能得到一些改善，但不能說這就算完全提高了生活水準，衣、食、住、行以外的育樂，如：衛生醫藥、教育文化、社會福利中的養老、育幼、濟貧、公廁、公墓、公井等社會事業，應有專業單位同時輔導。中美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稱「農村」，而不稱「農業」，意義正確。

(六)公地歸私，應培養農業人才，增加其耕作技能，使對農事增加興趣，不致見異思遷，因此各地農校應多加維護。

(七)工業逐漸發達，應注意務農的收入，不能與經營工業的收入相差過鉅，否則農民將羣趨都市，使農事荒蕪，農業不興，工業將失去穩固基礎。

基層演習一段歷史

復興基地臺灣省各縣市的公地放領，係由三七五減租後，朝向耕者有其田過程中的重要措施，此一政策的推行，造福農民至深且鉅，農復會的補助計畫自民國四十年至四十二年完成，我奉派參加公地放領工作，亦到四十二年爲止，此後即轉而致力於「基層民生建設」工作。

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導三民主義以民生主義爲中心，蔣公介石更手著「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大力主張改善人民生活，從事長時間的基層工作，瞭解到人民迫切需要的是衣食住行育樂的改善和增進，國家多難，我們努力於此項工作太少，我和農村工作的朋友們，互相勉勵決心在基層工作方面多盡心力，以補救過去的缺失。我雖然不負責實際行政責任，決心以國民一份子的地位，多方設法從事基層建設工作。

民國四十一年春天，我受聘擔任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輔導委員，設計研擬黨政演習計畫，完成「黨政演習要領」、「黨政演習實施綱要」、「黨政演習革命書」。這是遵行總統兼院長蔣公介石民國廿八年三月在重慶南溫泉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一期學員將畢業時的指示。蔣公說：「高級黨政人員不知基層作業之實況，則發號施令，一定不切實際，更難符合人民要求，應舉辦黨政基層演習，而且應仿效軍事演習，將人、時、事、地、物，規畫絲絲入扣。」蔣公當年作此訓示後，中訓團黨政班第一期將畢業，準備已來不及，祇將小溫泉一帶作戶口調查，分區清掃而已。我向教育長王東原先生說：蔣公指示的基層黨政演

習，恐不如此簡單，我願率領數人，不管他事，專心擬定是項計畫，俾作以後各期的實施準則。我請求不管他事，王東原先生不同意，那時我任中訓團考核組長工作已够繁重，黨政班係匆匆初辦，原中央訓練團大批工作人員，尙滯留在湖南零陵、廣西桂林、貴州貴陽途中，教育、訓導、軍訓，一切雜務都由我負擔。有一次吃過飯，我去洗臉，在這短短時間裏，王先生就派人找我兩次，我的住家與職員宿舍同等距離，王東原先生一定要我住在職員宿舍，以便聯絡。這樣情形下，我要放下瑣事去專擬計畫，王先生當然不同意。黨政班第一期結業，接着搬遷復興關，辦完第二期。我請十天假，王先生說，十天休息不够，他要到他處休息十五天，也要我請十五天假去休息。我藉此機會回家鄉省視分離了十一年的老父和兄弟姊妹。演習計畫無時間擬訂，辦完黨政班第三期，我就辭職去任瀘縣縣長，考核組長職自第四期起由雷股先生接替，從第五期起就由倪文亞先生接辦。很慚愧！我對蔣公指示的基層黨政計畫，迄至大陸淪陷，無機會完成。我將這經過報告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萬耀煌先生，萬先生堅要留我在院裏作輔導委員，完成「黨政演習、計畫」等各項規章，重點在於注意基層工作，施政目標在於如何符合人民的需要。參加這項撰擬計畫的同學，還有三位留院輔導委員。

視察木柵實地了解

民國四十三年春天，革命實踐研究分院主任任覺五兄來到我家談，邀請我到分院與王元輝、李仲達兩

兄作設計研究工作並兼任講座講授基層建設課程，負責演習設計指導。覺五兄歷來講話懇切，我說：「辦理訓練總有目標，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的訓練是實行新縣制，發動民衆力量，共同抗日，革命實踐研究院的訓練是建設臺灣反攻大陸，我們建設臺灣應注意增加生產、改善人民生活，此與民生主義爲三民主義中心之意義相同，無論訓練主旨或演習計畫，均應照此目標施行，你如同意我的淺見，我自當敬謹應納。」覺五兄說：「好嘛！好嘛！」於是我每天前往木柵分院，研擬完成了基層黨政業務演習計畫，爲着更具體了解基層，我建議每一期學員到附近鄉鎮公所去「觀察」，知道作些什麼？是否便民？是否合乎人民需要？有些什麼該革新？回來每位學員都要填一張「觀察」所得的意見表，不但使演習內容更充實，同時也是一種實地教育。祇是講祇是看還不行，應該付諸行動，就能作的作一些，讓學員更有深刻印象，稱之爲「實驗教育」。要作就要經費與技術，於是與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復會）和臺北縣政府合作，尤其是農復會，我在四川與農復會合作辦理農地減租，和農復會的人是頗有往來，知道農復會辦事很科學，它需有徵信的事實，有具體的計畫，有預期的效果，有自助人助的精神。尤其是儘量避免中間的轉折，熱心人士去穿針引線可以，作起來最好由地方老百姓直接聯繫。先舉行農村調查，邀請臺大農學院同學擔任，由臺大農學院的黃聲鐘先生任領隊，請農復會崔永楨先生指導。就調查的資料，作統計分析，廿幾年前木柵鄉全鄉的人民中，大學畢業的僅一人，往後這些年就很多很多了。農地不多，生產技術落伍，環境衛生很差，家庭衛生也談不上，婦女生產連有護士常識的接生婆都不多，更難找婦產科醫生。生下的小孩

，死於破傷風的不少；癩病也多，醫藥奇缺，更說不上社會福利與文教康樂。有了這些資料，任覺五兄和我去看農復會主委蔣夢麟先生，說明我們想做的事，與復興農村都有關係，請農復會支援，蔣夢麟先生答應先到木柵鄉看看。到的那天，不巧！任覺五兄不在。當天本來無太陽，到了樟腳村考察，烈日當空，我們都未帶傘，蔣夢麟先生以兩手持手巾覆蓋頭上，走了很多地方。當時蔣夢麟先生以近七十之年，有如此精神，真令人佩服。看完交換意見，夢麟先生答應先做些衛生工作。隔一天農復會秘書李循和兄和衛生組長許世鉅兄來談，問得很多，世鉅兄突然說：「不能作！」循和兄在旁說：「蔣主任委員已答應作。」許說：「蔣主委答應，我不答應！」大家面面相覷，勢成僵局。許在四川配發各地醫藥用品時，我與他認識，知道許是熱心人，祇是有個性，說話衝動，我耐心的向他說明，拿出調查資料給他看，預料有遠景，有受社會重視的成就。許始勉強答應先辦婦嬰衛生，設三個檢查站，作產前檢查與產後檢查並作農家訪問。要三天內提出計畫一式五份。這是一個星期五說好的，下星期一他要到上辦公室時見到計畫，我在家裏寫好計畫，星期日研究分院無車來接，我叫了一輛三輪車（當時無計程車）到分院，分院無人辦公，也找不着複寫紙，祇好自己動手寫，到正午分院秘書易秋潭來，看不過去，遂幫著寫。當天送到農復會值日處。後來簽約補助經費，多方想請到一位婦產科醫生，竟然是日裔華籍老婦人，能力不夠，不久始尋得另一較適當婦產科醫生。三個檢查站是我幫同佈置的，牌子是我親手寫的，工作人員當然免不了用些交通費和餐費，是我掏荷包，這倒算不了什麼！受檢查的要每次得點奶粉或維他命丸才感興趣，我也設法解決。後來大勢

所趨，很自然的要辦環境衛生與家屋衛生改良。

環境衛生醫療服務

遂與環境衛生所和國防醫學院合作，得研究分院任主任大力支持。在長遠的過程中確實費了若干思考 and 心血，也費了許多勞力和口頭解釋。農家環境衛生，頗有規模，有鋪石子的道路，有整潔通暢的水溝，有高邊加蓋的水井，有鋪水泥的曬穀場，清掃的垃圾有堆集處和焚化處，有堆肥製作處。家屋改良，屋開窗，牆刷白，廚灶改良；各人洗臉手巾、漱口杯、洗臉盆分開；食物加蓋；臥室內不放尿缸，有專用的廁所，不用時加蓋；有浴盆或淋浴；豬舍改良等。誰說農家污穢不能進去？蔣夢麟先生參觀後笑逐顏開，因為未改善前他看過，有個比較，還帶了農復會中西高級人員來參觀數次。衛生所與研究分院開辦民衆診療、防疫打針，還辦了一次肺結核檢查。檢查機構的要求，要達到全鄉人數的百分之九十幾，木柵的民衆有出外經商的、有煤礦工不易出坑的、有服兵役的、有在外的學生、有住在遠山中的、有公務人員已經檢查過的，而檢查車工作人員有辦公時間限制，老百姓有時間，檢查車未到；檢查車到，老百姓又出門求生活去了。許世鉅表示受檢人數不夠標準，我親自到場，敦促研究分院朋友、醫生、衛生所人員、鄉公所職員去到遠山鄉野挨門挨戶敦請受檢，死去的易秋潭兄開玩笑說：袁公的「司刀令牌」都用盡了。四川的巫師稱端公，用符咒捉鬼，如捉不着，用上「司刀令牌」，已經是最大的努力。結果負責檢查的人說：受檢人

數與全鄉人口的比例，大致可作爲統計試驗的資料了。許世鉅對此事先說過：「對百姓有益的事，老百姓不會不來！」我對他說：「不是那樣簡單！」爲了宣傳衛生教育，曾巡迴放映衛生教育電影數十次。當時木柵無自來水，曾努力籌辦自來水廠，其過程歷盡艱辛，水廠成功，對改良飲水有莫大的裨益。

共同成立輔導機構

輔導民衆起來作自己需要的事，請有關機關協助，這個原則既然有效，就要聯絡有關機構成立一個輔導機構，農復會、環境衛生實驗所等已大力幫助，那臺北縣政府就責無旁貸了，於是請臺北縣長和各單位主管及一部份縣議員來，說明我們的想法和要做的事，有人似乎有疑慮，我說：「不違背現行法令，不破壞行政系統，不加重人民負擔。」縣府儘可能在原定事業及預算中，酌予配合。該作的工作項目，不妨由縣府所選出的工作人員擬定，以釋疑慮。最早的工作項目是縣府單位主管也是基建會委員擬定的，照老樣分民、財、教、建，老實說：這不適合我們工作的重點，我們的工作，不能包括民、財，祇能包含在輔導教、建裏，爲了免除誤會，暫時留存，以後工作固定再修改。就這樣才能成立「臺北基層民生建設輔導委員會」，有關係單位的代表和有關係的人士都是委員。分院主任、臺北縣長、農復會的代表是常委，我是委員兼總幹事，下設總務組、設計研究組、社會服務組、保健衛生組、輔導組，還設有秘書，所有人員都是兼職，事務就落在總幹事一人身上。爲了名正言順，向省府立案，當時省府主席是嚴前總統家淦，主任

秘書是老友馬兆奎兄，原機構名稱，是臺北區基層民生建設輔導委員會，因為我們的雄心，不祇限於臺北縣，所謂臺北區，想包括苗栗以上各縣市局，而且慢慢要擴大普及全省。兆奎兄知我意，不用臺北縣，也不用臺北區，因為臺北區究無明文規定，所以就用臺北基層民生建設輔導委員會，奉臺灣省府民一字第三六七六號代電核備在案。基建會遂於民國四十四年五月七日正式成立。而且先總統蔣公早於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在官邸面示研究分院主任覺五：「理論與實際配合，教育機關應影響當地社會，分院需輔導附近地區基層業務並備研究員實習。」這更是有力的根據。

在小學辦示範廚房

基層民生建設工作，一面在木柵鄉作，一面想建築「基層民生建設中心」，將基建工作預定成就，在該中心展示出來，以促工作之進展。從各方面搜集的資料，堆集如山，預備研究結果作成計畫及進行方法，分別陳列。並在分院的對面，購置了第一批土地五、七八九·九坪，費了許多心血。地有了，已修建民衆會堂，作民衆聚會和辦各種補習班之用，又修了保健所，作民衆診療之用，保健所的門額是蔣夢麟先生題字，這兩種建築經費，農復會的湯惠蓀先生和熊鼎盛、林詩旦兩兄幫忙很大，我還親自監工，也修好了大門，大門是分院學員捐獻的，後來分院遷來，其餘預定的建築就停止。

木柵國小學生多，教室不夠用，有的在上課，有的在教室外坐在地上。我請農復會補助九六、九四五元

，添建教室，又修了一幢示範廚房，清潔適用，藉此教授民間婦女「食物與營養」。擬使木柵國小推行社會中心教育，覺五兄同我偕同基建各有關人員及木柵鄉長張榮森、木柵國小校長劉山銘去桃園參觀推行社會教育中心的兩個國小後，確定木柵國小之教育目標與原則，訓練學生要有勞動習慣與就業智能，利用社會資源，充實學校設備，學校設備亦供社會利用，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學校成爲鄉民康樂中心，教育即生活，加強學生就業指導，於是學校應有農工商技能訓練。有各種社會教育與文化運動，如民教班、家事班、商業班、木工、泥工、電工補習班，民衆閱報室，開放圖書館，舉辦時事講座，盡力舉辦社會服務，如清掃環境、鋪修路面，暨協助農事等。開放運動場，舉行球類比賽，定期放電影及音樂欣賞會等。要辦這許多事，當然需要增籌經費，增加設備和多方商請够水準的技術人員與專家協助。

推廣農村生產副業

根據過去經驗，在農村辦理各項事業，如無組織，效果不彰，尤其是生產事業。覺五兄與我去中南部曾參觀農業推廣教育，在嘉義民雄看到廖季清兄所指導的四健會作示範表演，我決定在臺北促辦其事，李循和兄來信告訴我，因北部有關機構似乎不大熱心，故難倡辦。我爲此事到臺北縣政府、宜蘭縣政府、陽明山管理局，與縣長、局長、單位主管和縣鄉農會的總幹事，往返商洽，始獲熱心贊助。木柵鄉的指導員，農復會請由基建會遴選，在研究分院受訓學員中，選出很精幹的學員蔡添水君擔任其事，被派爲基建會

職員參加農復會訓練擔任木柵鄉的四健會的發展。生活方面，研究分院予以照顧。業務開展，運用新的科學技術，改進耕作方法，增加生產，改善生活。很快的成立水稻、蔬菜、養豬、養雞、養鴨、家政、養兔等各組，這種對青年健腦、健身、健手、健心的辦法，使其有生產、自助、服務，公民常識的興趣，非常成功。有一次執政黨中央黨部有優秀幹部集會，請四健會養雞組的小朋友去表演開會交換意見，並作養雞示範表演，大家驚異這些小朋友對會議規範之熟悉和示範之周詳。中央黨部第一組副主任羅才榮兄當場說出他的感想：何以四健會組織健全？因為他們有共同的利益。何以會開得好？因為有開會的內容。何以服從幹部（指四健會指導員）領導？因為幹部能為其解決問題。這從組織的角度來看，說得非常透徹。那天的演習是請任主任覺五主持，由我在場說明，演習完成後，我就成為大眾包圍詢問的對象，尤其是一些負責經濟事業的主管人員。木柵周圍的茶，就是屬於所謂文山茶，生產面積廣，因有一段時期，極少數生產者偷工減料，外銷失去信用，覺五兄曾同我們去種茶的山場考察過。我曾請農復會設一專家，負責指導改良種植和加工，後來想到此類專家在留學生中實在不容易找，還是在國內找才是，我費盡了口舌，大力呼籲，以後才逐漸興起。最初辦一農忙托兒所，很花了一番功夫，後來辦成功，有人來參觀，兒童都表演唱歌遊，我總拿出一百或兩百元來，以主要參觀人的名義，送給兒童買糖果，同我去的基建會職員說：「此錢無從報銷。」我說：「我自願出，不必報銷。」後來有六個村都辦了托兒所，還時時送些奶粉。又接洽銀行對窮苦農民作低利貸款。在基建會旁建自來水廠，改善農民飲水，也建了公廁，還免費借貸一批收音機

予農民，事實上就是贈予。在民衆會堂辦了若干期縫紉班，還辦了若干期鄉村衛生工作人員訓練班。民衆會堂還可作民衆集會和婚喪喜慶之用。總之，社會福利事業，憑木柵民衆與基建會本身力量和有關機關的力量，能辦的就盡量去倡辦。

基層民生四大建設

木柵鄉的基層民生建設，已具規模，中外參觀人士絡繹不絕，基建會的職員和有關的老百姓，真是應接不暇。例如：東南亞婦女衛生聯合會主席代表紐西蘭籍的羅斯女士參觀木柵基層民生建設後，出席四十七年在東京舉行的年會上說：「我視察大陸專制區及臺灣自由地區鄉村生活後，才知道臺灣農民既有自由又享幸福，所有建設工作，皆出自人民自動自發自願……。」聯合國亞洲區勞工局副局長詹姆斯，於民國五十年夏參觀木柵後讚譽其作法，認為木柵之設施，其實效堪作爲聯合國在遠東地區改良舊社區，發展新社區之參考。美國洛克菲勒基金委員會執行長慕勒斯，參觀木柵後稱：「我在印度從事農村建設九年，其經驗、辦法與成效遠不及此間所作所爲，惟臺灣大學缺乏村建科系，必須訓練此種人才，始可繼往開來。」英屬北婆羅洲農業次官劉天和先生於五十年參觀木柵農村後稱：「這才是人住的地方，簡直是了不起的工作。」

經過這些工作經驗和長時期的考慮，遂明定基層民生建設工作分四大類，一、生產建設。二、文化教育。三、衛生保健。四、社會福利。不再用民、財、建、教，這是民國四十五年的事。我深知此項工作有

深厚意義，要普及全省，現在是白手興家，點滴求人，終有一天會自助助人助。後來知道宜蘭縣李守廉兄，在宜蘭也在作類似的努力。原來在木柵常常協助我們的農復會林列兄，在桃園縣龍潭鄉由農復會全力支持下，也作同一類似的工作。

民國四十七年春，覺五兄調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經多次談商，邀我一同到省黨部去工作，我毫不考慮的遜謝了，真對不起朋友！到省黨部我不會祇辦基層民生建設，一定有很多事都會要我參加，則非我所願，因為我的時間不够分配。我在臺灣省農會人員講習所，是從事增加生產，改善農民生活另一大事，拋棄了與我志願違背，我祇答應由省黨部推動基層民生建設，我不要各位報酬，盡力參加。我在研究分院辦基層民生建設，是覺五兄完全支持，覺五兄去，我當然辭。繼覺五兄任的是吳兆棠兄，接專前與接事後，都親來訪過我，請我繼續主持基建，我均辭，最後吳說：「幫覺五忙，不幫我忙，友情上說不過去，而且這些你花過心力的事業，荒廢了豈不太可惜？」我勉強答應以基建會委員名義來主持，不願以委員名義再兼總幹事。基建會委員會不設主任委員，祇設三常委，三常委研究分院是其中之一過問事，其餘二位不管事。我表示不兼總幹事，兆棠兄就添了兩位常委，我是其中之一，仍免不了負責實際責任。下不設總幹事，仍設總務組、生產建設組、文化教育組、衛生醫藥組、社會福利組，都是研究分院組長和高級職員兼。我原是分院一位兼任設計委員與王元輝、周開慶、李仲達諸兄同，都不在分院編制以內，是臨時聘用人員，吳兆棠兄來，不設臨時人員，設計委員名額不多，竟列在編制以內。這樣一來，不好意思，我幾乎每天必

到分院處理業務，保健所正在此時興工。農會人員講習所在天母，基建會在木柵，正好一北一南，有時一天竟跑兩次來回，基建會無固定負責人如何可以？才增設一名執行秘書。不久中央黨部一部分遷分院，分院遷基建中心，基建中心的土地收購和最初新建的兩幢房子的由來，我盡了很大的力量，恐怕已很少人知道了，基建中心雖然由分院遷來辦公，但基層民生建設工作依然加緊進行。

木柵經驗推及全省

覺五兄接任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要新任第二組總幹事李守廉兄到職前曾來天母與我談基層民生建設事，我在省黨部不要任何名義，但省黨部未搬臺中前，竟給我佈置了一間辦公室，不出我所料，很多事覺五兄都要我參加，但我主要目標是注意基層民生建設，很快就成立臺灣省基層民生建設委員會，下設各組，如生產建設、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社會福利等組與在木柵分院相同。覺五兄和有些朋友竟添設綜合組，我為基建會委員兼綜合組召集人，事又落在我肩上。訂定基層民生建設實施綱要，縣設縣輔導委員會，鄉鎮設執行小組。任主委接事不久，在很匆促時間內，即在省黨部辦了一次基層民生建設展覽：一、展覽的目的：使社會民衆對基層民生建設工作有明確的認識，獲得幫助；二、內容：(一)重點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二)包括基層民生建設實施的方法、步驟及預期成果；(三)採取理想與現實對照之表達；三、資料，包括圖片、實物、模型、統計、表解等。這些資料是研究分院主辦的臺北基層民生建設搜集或臨時製成

的，數量太多，似乎雜了些，但有參考價值。現在想起來，不知爲什麼能在極短時間，做成功這樣一次可觀的展覽？我想能在省黨部發動，一定在全省可做些幫助增加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的事，以建立民衆的好感，這是有意義的，所以日夜不斷的趕作。

省黨部遷臺中，任主委巡視各縣市黨部，邀我同去發動各地方基層民生建設運動，當然有主管農運的李守廉兄同去。我記得在嘉義開會，召集黨的幹部和地方人士，說明基建的目的與辦法，民衆服務站以服務方式發動民衆自覺自動，就其生活需要，舉辦民生育樂事業，聯絡政府與有關機構配合協助。黨部幹部辦理民衆生活所需，接近民衆，自然會有民衆愛護。有一位老同志聽到說明以後，老氣橫秋的說：黨辦了幾十年，我看現在才真找到辦黨的正當途徑。

基層民生建設，在執政黨的中央黨部是屬於農民運動，主管的單位是當時中央黨部第五組，主任是上官啓我兄，主管農運是當時副主任張寶樹兄卽後來中央黨部的秘書長，他們對此事異常熱心，如能由中央黨部訂定辦法明令施行，那就容易得多，於是遵照國父遺教及總統蔣公手著育樂兩篇補述的原則，求徹底實現民生建設爲目標，爲統一工作步驟，使民生主義的實施能大步邁進，遂約集有關機關周詳商討，我當然參加，何況我也是農運小組委員，訂頒「推行創建民生建設實驗區工作實施要點」，決定推行範圍除農村外，增列漁村、鹽村、平地山胞等村，使這些貧苦的漁民、鹽民和平地山胞，亦能獲得改善生活的實惠。此項實施要點，在民國四十七年八月由中央委員會第五組頒發，明令通行，這就不能說是少數人的意思。

了。這樣一來，發展很快，各縣市都紛紛爭取，到開始要作的時候，我大多數都去參加。農復會很熱心贊助，但補助經費有限，而且各項工作都各有主管，我曾經在各方爭著要辦的時候，說出：「研究科學而可行的方法，較過度熱情尤為重要。」各機關適當的協助，處處需要說服，人人過份依賴有關機關，不知自助方得人助，也須時時說明。雖然如此，後來不久就發展到全省廿一縣市，二百多村里，以及鹽村、山地，再後就發展到五百一十七單位，而且擴張到金門、馬祖。臺灣省議會二屆第一次大會一致通過：「請政府普遍推行基層民生建設。」

我同農復會葛維廉組長等，陪安全分署美籍顧問蕭復(Shaefry)去實地參觀後說：「這是農村革命工作，使農民生活的改進，提早二十年。」不知何人告訴他是執政黨中國國民黨在發動推進。他很驚訝！他表示，他以為中國國民黨如美國政黨只辦選舉，現方知還為老百姓作改善生活的倡導，這是一個美好的範例，他將報告美國國務院，並報告聯合國；後聞聯合國的報告中，載有中華民國有兩大成就：一為土地改革，一為基層民生建設之說。

蔣公嘉許具體指示

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三月八日先總統蔣公介石巡視桃園縣復興鄉民衆服務站，由服務站負責人

報告農村基層建設工作，蔣公頗爲嘉許，後來上官業佑兄告訴我說：蔣公曾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中講到農村基層建設工作並有具體指示。在推行基建正陸續達到高潮時，據說有人批評：

「黨來發動基建工作，不是黨政不分嗎？」

這是一項誤解，老實說：中國國民黨是執政黨，黨的主義政綱政策，必透過政府實施，黨與政府不能脫節，黨如不發動民衆推行政令作建設性活動，黨便失去改革政治的立場，黨員與民衆組訓亦難納入正軌，黨與政不能與民衆脫節，黨失民衆則無基礎，政失民衆則政權動搖。得民之道，首在解決民生問題，亦即增加生產，改善人民生活，捨此而外，如欲得到民衆歡心，誠非易事。

因此黨能掌握爲民衆服務的機會，發動民衆，推動民衆自己需要的民生建設，正是爲民衆服務的最好方法。既不破壞行政系統，又不違背現行政令，更不增加人民負擔，純粹是以民衆自身力量，聯合地方原有機構，配合農村建設有關事業單位：農復會、環境衛生實驗所、紅十字會等，以輔助地方政府之不足，這並不與地方政府衝突。人民所需要的事，政府固然該做，但有時不能全面顧到，社會團體與個人當做慈善或公益事業，也可以作，這樣朝野上下全體一致的合作，正是政治走上軌道的捷徑。

此一認識和見解我於四十八年六月增訂臺灣省基建會所編印的基層民生建設參考資料第一輯時，曾在前言中一再申述（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廿五日我寫的瑣記裡有記載，也曾錄音），話雖如此，從政人員總覺顏面所關。黨部農運工作人員太少，頻添上這樣多的麻煩，在觀念上與歷來辦黨的習慣不同，遂種下以

後交與政府辦理的誤解說法。

民國四十八年七月底，任覺五兄回木柵革命實踐分院任主任，接任省黨部主任委員的是上官業佑兄，基建工作照常推動，但臺灣省基建會勢將改組，任覺五、上官業佑兩兄雖係舊好，仍須協調。於四十八年十月十七日開第二次基建會，大家都到，基建會改組，不設主委，祇設常委。請蔣夢麟先生、上官業佑、任覺五兩兄爲常務委員，我和省黨部李守廉及農復會林詩旦爲委員兼執行小組委員，我又是召集人，此會通過議案甚多，並正式將工作項目再依順序列爲生產建設、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社會福利。

因前配合不够，察覺已晚，在基層民生建設實施綱要中，竟刪去「社會福利」，添一「改善生活」，改善生活是目的，而基建四大工作，均爲改善生活，此次更正，非常重要，但已經發出的文件中，均有改善生活而無社會福利，更正之決議案，承辦人又疏忽未通報週知，以致以後「社區發展」沿基建舊制，上列改善生活爲工作項目，一誤至今，深覺汗顏。

推動地方慈善公益

各縣市工作正展開，我有時還須親去，旅費自始至終都是我自出，這不算什麼；但時間總覺得忙不過來。陽明山研究院與分院合併，正式職員將裁去不少，更說不上新增職員，但基建會總應有一位常駐聯絡人。

陳挺蘇兄先在木柵分院，後到省黨部，又轉回分院，均襄助基建事，但均非正式編制內職員，只支臨時補助費。分院合併時，我提出將陳納入編制內，秘書易秋潭兄說：陳恐難安排。我說：我將我正式編制名額讓出（吳兆棠兄任分院主任，將我名位列入正式編制內），安排挺蘇。易說：那你將來應享福利，如貸款建屋、退休金等均喪失！我說：

「爲了公事辦得順利，私人權利事，就不必計較了！」

爲了檢討和推進各縣市基建會，我建議開一次基建研討會，參加人員爲工作縣市輔導會委員、總幹事、建設局長、教育局（科）長、衛生院長、農會總幹事等，各縣市人員不但要將工作概況和將來計劃作口頭與書面報告，還須攜帶推行工作資料彙齊展覽，互相觀摩，重點在討論，先分組討論，指導員都是農復會、黨政有關機構之業務主管和技術專家。

最後綜合討論，足踏實地的一一解決問題，要向有關機構洽辦的，我們都毫不推辭，負起責任，最難講話的農復會許世鉅組長和一些專家，都認爲這一次研究會非常有用。研討內容與研討時間表，是我動手擬訂的。

任覺五兄說：希望研究院的訓練，逐漸照此方式，而研究內容也須力求如此具體。我現在還保留了一份研討會研討時間表，足資證明我們當時確在實事求是。也留了一張開幕時的照片，參加研討的是七十七人，均爲各縣市重要人員，四十九年二月廿七日報到，地點在木柵研究院，廿八日省去典禮，祇抽暇照了

一張團體照。照相開始時，中央五組主任張寶樹兄、省黨部主委上官業佑兄、研究分院主任任覺五兄互相讓位，久立不決；我一看座位中間有一高背椅，恐係院長蔣公來院時所用，我遂將高背椅移去，三人遂立即就坐。不管如何忙，凡事須先檢查，以免臨時發生問題。

省基建會管事的委員與各組組長，約同農復會與有關機關人員，曾赴木柵樹林，和宜蘭桃園所屬各地，對基建事業作一次精密視察和輔導，藉機與各有關人員交換意見。例如在宜蘭礁溪住宿一晚，與農復會葛維廉談至午夜，彼聽我談話後，認為基建為建設農村最有效方法。我說明由民衆感覺自身需要，自覺而後自動興起，再由政府與有關機關輔導配合，成就不但普遍，而且能長久保持成果。自覺之發生，有賴於人之啓發促進，再輔以教育方法，方克有濟。

葛維廉問：「你何能有此想法？」我說：我在農村工作久，也在地方政府負責年多，深知地方慈善機關、公益團體所作的事業如養老、育幼、濟貧、賑濟、造橋、補路、義學、義塚、捨藥、施茶等一切慈善公益事業，規模雖有大小，但都源遠流長，如有農村建設機關，誘導其自覺自動，加強其組織，改善其工作內容，兼顧積極生產建設，則將事半功倍。

大的建設，大的工程，政府說作就作，惟這些關於人民日常生活的瑣事，如家屋改良、衛生清潔和慈善事業等，就不是政府一紙命令就容易貫徹。要設法使人民自動來作，這些事不是小，是有關一個民族的文明與落後，這與政府工作毫不衝突，而是互相幫助的。葛維廉甚然其說，並言歐美國家，民間所做之

公益成就，皆非政府力量所能兼顧。此與以後真能了解「社區發展」之說相同。彼表示願在職掌內盡力將農業推廣教育與基建事業配合。創辦基建有一基本態度，決不與人爭功，祇求事業之成功，如其他機關將配合所作之事，寫作他們所作的成果，亦聽其便，故得人之助不少。

社區發展的新名詞

基建事業在木柵分院於四十三年從理論到行動，經觀察、演習到木柵樟腳等村實施衛生保健、生產、文教，四十四年五月正式成立臺北基建輔導委員會，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民生建設單位，在全省逐年增長，正有蓬勃之象，此時有前在社會部任職之張鴻鈞兄由內政部社會司副司長黃永世陪同，來天母農會人員講習所見訪，彼為舊識，見面即直言彼在聯合國任職，負責推廣「社區發展」業務，與有關機關接洽，皆言「不能辦」，尤其是都市更不能辦，聽聞我努力之基層民生建設事業與彼推行之「社區發展」頗類似，將來請教。所謂「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之原則，係啓發人民自覺自動自發之精神，研究其地方環境需要，與人力物力之具備條件，設計公共福利之計畫，由人民組成一服務組織施行，政府作間接的輔導和支援。我問其聯合國之「社區發展」打算作些什麼工作？彼答：「尚無定論」。又我問社區發展打算在臺灣作些什麼？彼答：「更無確定」。我說：臺灣的基層民生建設，正與社區發展原則巧合，經數年之努力與探討，工作項目分生產建設、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社會福利四大類，無論鄉村與城市，可就其雌

要與能力所及，就此四項工作，分別緩急，選擇辦理。我介紹他們到木柵、樹林，及桃園、宜蘭兩縣所屬鄉鎮去實地參觀。彼聽聞後，高興的態度，至今猶能記憶。最後我問：「聯合國推行『社區發展』，有無經費幫助？」彼答：「有，但祇作宣傳和訓練之用，對實施業務無幫助。」我鄭重的說：「彼曾在國內作過公務員，須知憲法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我等是實行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之內容，而辦理此事，有自勉與社教的作用，希望不要因聯合國的少數經費幫助，而將我們基於奉行民生主義之自有名稱，改作『社區發展』之生疏名詞。張答：「社區發展係由英文 Community Development 翻譯而來，在國際間用 Community Development，中文用何名稱，則無限制。彼雖如此說，我總意識到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姓名「基層民生建設」，將有改成洋名字的一天。以後聯合國開始「社區發展」的書刊源源而來，聯合國又要我介紹與此事有關之學者專家，將同樣寄些書刊去，我記得我介紹了任覺五、湯惠蓀、劉修如、李守廉、李鴻音諸兄。這些書刊理論多，辦法少，也介紹了些落後地區的工作現況，祇有少許一點一滴的工作，遠不及我們所做的充實。由張鴻鈞來談後，既慚愧又驚喜，慚愧的是因為忙，不看書刊，聯合國推行的「社區發展」，我根本不知道，驚喜的是憑個人的構想，竟遠超出聯合國專家羣之前，而經實行的經驗所得的工作範圍和方法，竟作了聯合國推行社區發展的範本。民國五十年曼谷曾開東南亞社區發展工作會議，當時曾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人，將臺灣「社區發展」情形向大會報告，其他與會的各國代表，都公認臺灣的「社區發展」在東南亞地區，遠較其他各國遙遙領先。其實在民國五十

年，臺灣各鄉村尙未開「社區發展」這個名詞。當時報告的臺灣「社區發展」，也就是臺灣的基層民生建設。

引起新聞界的重視

基層民生建設工作，在臺灣農村生了根，普遍的去向每一角落繁衍，大多數報社均作實地訪問，有社論、有特寫，中國國民黨前中央第五組於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將各報之社論特寫編成「基層民生建設實地工作訪問實錄」，內有社論特寫三十餘篇，英文兩篇，凡一百二十餘頁。這些文字不是閉門造車，是親見親聞所寫下來的具體事實，對默默的基建工作者鼓勵甚大，中外人士閱覽之下，可以說：「一新耳目」，現摘錄一些片斷，祇能說舉個例，其實寫得好的太多太多，不能多錄，請當時寫社論、特寫諸先生和各報社諒解！尤其摘錄不得當，且有顛倒錯落，更請特別原有！

訪問實錄集成文獻

基層民生建設實地工作訪問實錄，祇訪問臺北木柵首創鄉鎮和臺北其他鄉鎮，桃園縣部份，摘錄太少。更可惜重要的宜蘭和其他縣未訪問，均無記載。革命實踐研究院也招待各報社記者訪問一次，其採訪文字數見各報，惜未彙印成冊。此外蔣夢麟先生與任覺五、上官業佑兩兄共同發表「農村復興工作與基層民

生建設實驗的回顧與前瞻」，中央第五組主任張寶樹兄也發表了「基層民生建設實驗工作推行情形與大陸鄉村建設及聯合國社區發展工作之比較研究」，中央第五組又編印「觀察各地基層民生建設實驗村工作報告」，任覺五兄發表「臺北基層建設中心輔導委員會工作概況」，李守廉兄寫了一本「三民主義新社會建設」，我寫了一本「基層政治建設」，這是要辦基層民生建設之前寫的。開始辦基建時，寫了一篇具體而微的「基層民生建設」，作研究分院教課時的大綱，自始至終的推行計畫與各項文件，出自我手的極多。再基建會與臺北、桃園、宜蘭、臺中、彰化、南投、臺南、屏東各縣各實驗區均編印有有關文件。農復會還精印一本中英文對照「臺灣省基層民生建設實驗農村」，環境衛生實驗所和紅十字會出了大力，必然有文字的記載，不過我很少看見。

我們對倡辦基建工作，有一基本態度，雖然是我們在構想，在創造，是與有關機關作聯絡工作，但是我們不爭功、不諉過，參加此項工作的機關或個人，各作各的工作記錄，你說是你做的，他說是他做的，我們一概承認，只求能來熱烈參加或贊助，達到改善人民生活就可以了。所謂臺北基建會是藉革命實踐分院的支持，也就是分院主任任覺五兄的大力維護，能够推行到臺灣全省，也是覺五兄作了省黨部主委的熱心，我隨其到各縣發動倡導，我無任何名份，別人也無法稱呼我，有人誤稱爲顧問，更有人誤稱爲專家，很慚愧！我都不是。在省黨部的農運單位主管是李守廉兄，守廉兄與我是老同學，我稍年長，在推動的會上承他客氣，讓我先講。有人硬要問我是何職位？我祇好說：我是省民生建設委員會的委員之一。在木柵

初辦時，前面說過，得到農復會的援助，蔣夢麟主委、李循和秘書、許世鉅組長、柳錦霞技正，以後湯惠蓀組長、熊鼎盛、林詩旦、林列各技正都幫過大忙。執政黨中國國民黨作為政策上的推行，第五組上官業佑主任、張寶樹副主任、王總幹事家澍，均悉心擊剴，指助良多。後上官主任繼任省黨部主委，張副主任寶樹升充主任，繼續指導省黨部的李守廉兄和許多同仁，鼎力籌辦，分院的吳延祺、湯燦華、李仲達、易秋潭諸兄，和幾位青年才俊之士等等都出過大力，尤其是陳挺蘇兄負責久，貢獻大。宜蘭縣的趙申年、桃園縣的陳宜瓊先生等，國防醫學院副院長彭達謀、社會醫學系主任李宜果和環境衛生實驗所與紅十字會的許多先生小姐等，都貢獻了很多智慧和辛勞。當然地方人士如木柵的張榮森、劉山銘等還有許多出了心力未提到的，都是無名英雄，地方上努力的人士太多太多，無法列舉，此事曾為各方所稱道，民衆的讚許，說得上「盛極一時」過。但是業務一天一天的擴大，辦事的人備極辛勞，尤其是經費要臨時向有關機關爭取，這當然是一件既費力又勞心的事。各單位主管人事變遷，大家都是忙人，對此事的看法有深淺不同，加上張鴻鈞受聯合國之命來推銷「社區發展」，而且有少許經費幫助的引誘，「基層民生建設」這塊招牌，必然受到收藏的命運，瓶子是「洋貨」，裡面裝的酒是舊的，希望不致有壞酒。

兩名並存成爲定案

在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中國國民黨九屆一中全會前，我曾將我的意見告訴能參與的任覺五等諸兄，萬

「討論基層民生建設與社區發展問題時，我建議在國際上用「社區發展」的英文字 Community Development，在國內不妨仍用原來的「基層民生建設」名稱，因為望文生義是我們在奉行黨的主義、執行黨的政策，由黨以服務方式，發動民衆來作，可改變辦表報的作風，藉此符合人民生活之需要。在國內基層民生建設之推行在倡言「社區發展」之前甚久，我們應有自信心，中國人或中國國民黨黨員之思想，並不一定落在聯合國專家羣之後，能參加此會的老朋友們，將此意見講過沒有，我不知道。國民黨九屆二中全会通過：「民生主義現階段社區政策」將正在推行的「基層民生建設」，改稱社區發展。五十四年四月八日由行政院頒布施行，後內政部擬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報請行政院於五十七年五月十日頒令實施，五十七年九月臺灣省政府頒行「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經費由土地增值稅撥付，由隨時張羅之貧民頓成有充裕支援之富翁，工作內容，仍照「基層民生建設」。凡事未決定前，可以貢獻意見，既決定之後，祇好一心一意的遵照執行，此即執政黨的「民主集中制」精神。木柵是發源地，我們仍在木柵繼續努力，主管社區發展的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人員與環境衛生處的主管，我們都曾請來會商過，不過因種種緣由，我們能幫忙的地區就有限了。以後也發生些有趣的事，基層民生建設要改稱社區發展，已決定而未改稱的時候，據說省府某最高主管去苗栗看了基層民生建設，非常欣賞，曾口頭表示：基層民生建設與社區發展可並存，並命令於某星期日開了若干部遊覽車送省府職員去參觀。但是這是一件事，不好有兩個名稱。某曾任黨政高級人員看了苗栗基層民生建設，曾表示：這是中國國民黨做的一件很漂亮的事。我也曾到此地去

參觀，其時早已改名社區發展，老百姓仍稱基層民生建設，我說：應該稱「社區發展」，得其回答說：基層民生建設說慣了，一時改不過來，而且「社區發展」在中文造句名稱上很彘扭，老百姓不易懂。我說：一切計畫、預算、公文書都稱「社區發展」，久了自然非改不可。內政部有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教育委員會，我受聘為委員，也去參加幾次，除了知名的社會學專家外，有聯合國派來的專家，發了一些書，談的都是海闊天空的理論，也參加臺北市的社區發展參觀組織，除了原有一處軍眷區外，還被引導走上公寓三樓一間屋裡去，既黑暗又污穢，恐怕是走錯了，又去了一處淡水河舊城邊一處違章建築區，祇有東倒西歪的破房幾間，還有人正在用油漆在破爛的木板牆上擦，太雜亂了！主管的較高級人員是否來看過？這數間人家遷到國民住宅去，附近一帶的廣大住戶，可享受整潔環境的賜予，否則就在原地改建一幢新樓房，貸給原住居民住，較年年補助清潔費節省得多，腦筋活用，何必如此呆板？內政部主辦社區發展中心是譚貞禧兄，有一次在會議上他突然說：我是辦社區發展的先知先覺。我聽了很慚愧！後來在一次會議上有一位社會學者很堅決的說：談理論我參加，談推行辦法，我不參加。真不知爲何？不久，這一外援機構，象徵式一點相對補助經費停止。實際的活動都在臺灣省政府和臺北市政府。

自助人助源遠流長

以後任覺五兄在木柵研究院退休，我亦超過古稀之年，在研究院無任何名份，但關於木柵基建或言「

「社區發展」事，仍儘量關注。原定在研究院旁之土地上，建一木柵模範社區服務中心，久未建成，仍多方繼續努力。土地是研究院的無問題，從前是以基建中心名義徵收的地，研究分院出的錢，由我代表基建會與張樹勳代表研究分院訂有合同，基建會要用人用地，分院應盡力義務協助。但附近居民爲道路之事，久延不決，此事促請吳延祺兄多方奔走協調，煞費苦心，陳挺蘇兄與木柵區公所老朋友切取聯繫，終於達成了。動工時我去看過幾遍，修成也去看過，直到業務開展，最下層書報室開放，預定去多留一些時，未乘公家車，搭公共汽車往，模範社區服務中心門前有站，車停舉步下車，一摩托車風馳電閃衝過，急縮步，毫釐之差，「可云險矣」！在書報室默坐長久，此事業已努力十餘年，今另有主管，推行另有組織，所謂「增加生產，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既達，應樂觀其業務蒸蒸日上，該縮步時應縮步！前面談到過，基建會是依附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內的。覺五兄去，詹純鑑兄來，研究院同事兼辦基建工作的與詹洽辦工作時，詹書面表示，基建工作已交政府辦，不必再管。詹與我是聯戰班第四期同學，他在省黨部和在中央黨部第五組接觸也多，深知他不願多管閒事的作風，洽商無益，何必爭論。惟「此事已交政府辦」之說有問題及保持成果之方法，不能不略抒己見，以作參考。乃將原擬送中央社工會農運小組之「社區發展與農村建設」一文（我參加農運小組十八年），略加刪改，特送研究院實踐月刊慶祝院長八秩晉八暨研究院成立廿五週年專號登載，以誌此事之經過。並特別說明：「基層民生建設」或「社區發展」推行的主要方法是：「自助人助」，「源遠流長」。辭句點到爲止，而且以「社區發展」並論，免有爭論之嫌。